

我那时 们的个伙

Memor De
Wang Shidai

申维◎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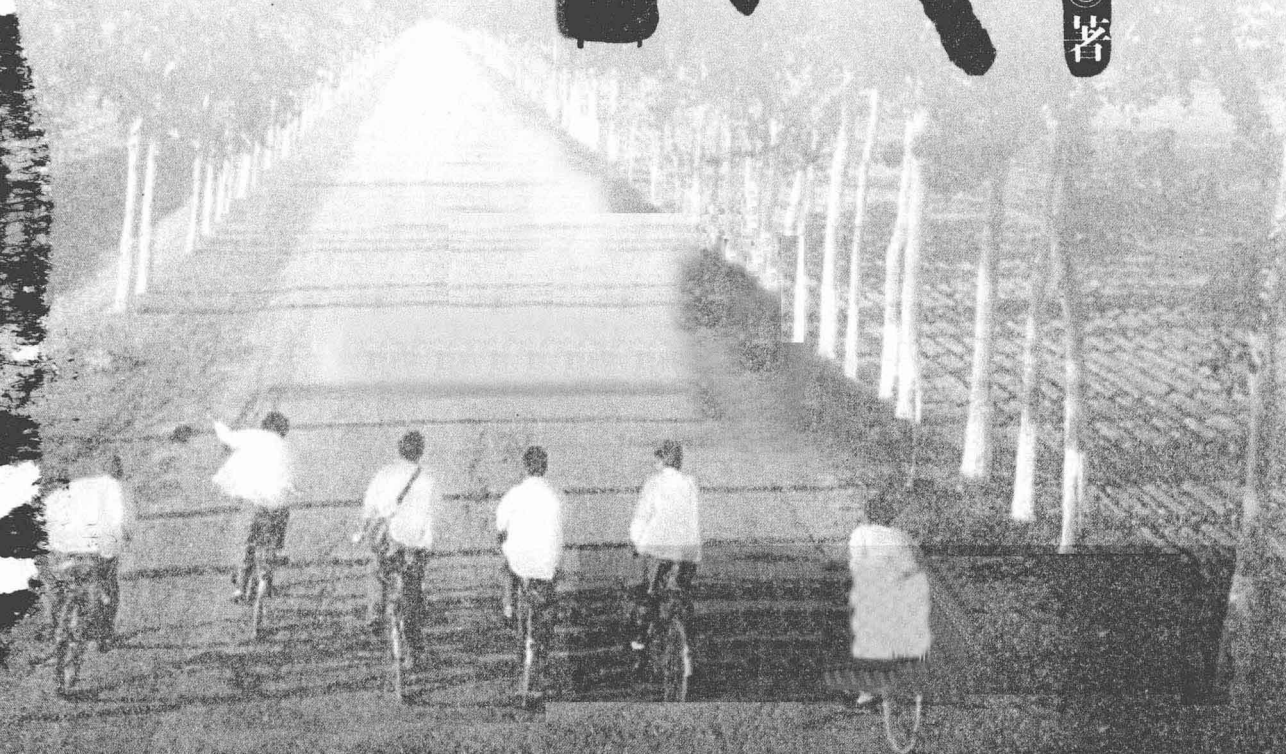
这是一部荒诞主义的社会文学，写的是人，也有事。既有宏大的社会场景，也有细微的生活画面；既有着历史表皮的速写，也有着心灵深处的挖掘。整部小说中，充斥着诸多荒诞主义的精彩画面，比如：死而复生、颠簸着小脚、呼喊着的“死狗子日的”的红奶奶；悬梁自杀、喜好在厕所中追杀着苍蝇的地委书记；为了一只鸡，而跳了河的老瞎子；还有一口用来积蓄人粪的大缸……在故事主人公老巴子眼中的人、事与世界，似乎很荒唐，然而这的确确是曾经存活过的历史。“我们那个时代”不仅折射了一种“老巴子”的眼光，更记录了整个“60年代生人”的集体成长史，是一幅幅彩色调的历史幻灯片。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我那时 们的年代

Memor De
Nage Jidai

中维◎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的那个时代 / 申维著. —天津: 天津社会
科学院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 - 7 - 80688 - 707 - 3

I. ①我… II. ①申…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71089 号

出版发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 版 人: 博文天下

地 址: 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 300191

电话/传真: (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电子信箱: www.tssap.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12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 ~ 5000 册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我眼中的60年代生人（序）

江小鱼

每一代人都喜欢给自己贴上时代的标签。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一拨人，占着中国人口第二多的人群。如果让我们从他们身上找出最显著的时代特征，那就是迷失，他们是迷失的一代。这种迷失有着双重意义：一是指对人生方向目标的迷失，称之为迷途；一是对主体的迷失。主体的迷失是指建构的自我人格的解构。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学术界的话题：“寻找60年代。”

60年代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有人称之为20世纪最激动人心的年代。在美国出现了金斯堡和马丁路德·金，出现了嬉皮士；在法国出现了左岸运动和五月风暴；在南美出现了卡斯特罗和切·格瓦纳；在英国出现了披头士乐队；而在中国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红小兵和红卫兵。这是一个激情四溢，盛行红色的岁月。理想主义、反叛、激情的思辨成为时代的主旋律。然而，光阴荏苒，日新月异，四十多年如白驹过隙，激情澎湃的60年代生者就将老去，有人公开宣称60年代生者即将淡出历史。

一种公认的说法是，60年代是生活于历史夹缝中的一代，生活于红色理想与金钱现实的夹缝中。我们把60年代生者与前辈、后辈们作一个比较，得出一个独特的结论：他们是现实主义夹缝中的理想主义的一代。这就像三明治最中间的一层奶酪。40年代生者亲身体验了战争残酷和个人在集体中的微不足道。他们亲眼目睹了腥风血雨和命如草芥。50年代生者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参与了“文革”和上山下乡，他们理想的激情之火刚刚点燃就熄灭。这两代人是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



者。40年代生者的顺应时代，与50年代生者的现实立场，使他们更能迎合和适应世代变迁，追赶商业大潮和金钱风暴的脚步。而70、80年代生者，在物质主义浸淫下成长，以更生猛、更放肆的姿态，迎合着新时代的到来。只有60年代，“后文革”时期成长的一代，人民公社、学大寨、学雷锋、共产主义理想等等，根深蒂固地影响着他们的一生，以至于无法适应时代变化的节奏，坚守着儿时的信念，去忍受理想与现实的煎熬。

当今，60年代生者的社会基础决定了他们的无奈。他们基本上成为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中坚。这些被理想浇灌长大的孩子，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在“后文革”废墟上，感受了一个时代的荒谬和寂寞，也感受着理想与激情的冲撞。有人说，60年代生者最大的挫折是生不逢时。“文化大革命”和上山下乡时，他们懵懵懂懂，一切只是青春的狂欢和游戏；前辈们经历的残酷战争，暴烈，铁和血，只是他们在教科书中学到的激动人心的梦想；改革开放后的商业大潮和商品时代的冷漠无情，与他们接受的理想主义教育格格不入，使他们成为今天时代的局外人。这种生不逢时的命运的挫折感，构成了60年代生者的历史缺席，使得他们陷入可悲的犹豫和彷徨。

回顾中国文坛，寻找一代作家的特殊使命和历史的足迹，有人发出如此感叹：“所谓‘60年代出生的作家’是前有‘大将’后有‘追兵’的一代。上有莫言、王朔那样的‘生猛大将’，下有像安妮宝贝这样的‘生化追兵’，我们被夹在中间，不得不把自己调到冲锋陷阵的状态，才能赢过这上下两代人。”一个时代的不幸，也许是一个作家的幸运。当今中国60年代生的作家已经成阵势，如柳建伟、徐坤、毕飞宇、刁斗、关仁山、东西、申维等，我们可以数出一百多人。

但是，也有人说60年代生者的黄金期已经过去，天然适应市场经济的后生代们正成为文化市场的宠儿。有一位评论家说：“80年代生人的写手们的纷纷登场无疑是一个时代精神的集体青春秀。60年代出生者看80年代出生者是愤青对男宝宝，70年代出生者看80年代出生者是小资对古惑仔。文学上，50年代生人沉痛地缅怀‘伤痕’与‘反思’；60年代生人抒写的是残酷现实主义的变革和觉醒；70年代一族则充斥着美女作家的矫情与滥情；80年代呢，一群挂在BBS上的……”



60年代生者是一个热门话题，在学术界，对此有许多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言说。作家申维的长篇小说《我们的那个时代》（《老巴子传》）是60年代作家对时代的特殊贡献，是60年代生者的一次集体梦语，是一部60年代生者的心灵秘史。

老巴子是盐商后代。盐商旧宅“迷园”在革命大潮中变成封闭孤岛，孤岛里的人的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脱离。“文革”时期，他初涉成人世界，残酷的现实扭曲了他的童年。“后文革”时期，他随父母下放“红旗大队”，红色风暴摇撼着古老乡村田园。在东方红小学，他又经历了一种怪诞的教育，这种教育使得60年代生者在新世纪陷入“多余人”的尴尬。

《我们的那个时代》以幽默、调侃、反讽推动全篇，突出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反差，既形象生动，又充满哲思，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作家以小说形态展示了一代人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是生于60年代作家的文学成果的杰出展现。这部小说被誉为中国版的《铁皮鼓》。



机智的文本（序二）

席云舒

作家申维前期出版的三部长篇小说，有两部是我作的序，这两部作品分别是《狼狈不堪的生活》和《爱情乞丐》。我在给《爱情乞丐》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把申维的这些作品称为“平民主义小说”。有关“平民主义小说”和“平民主义”的概念，我在最近的多篇文章中已作了较为充分的解释，这里就不再多说了。但有必要在此说明的是，申维的这部《我们的那个时代》也显然是站在“平民主义”的立场上来写的，它有着明显的批判“英雄主义”以及“英雄主义时代”的意识。虽然在今天看来，这种反思与批判“英雄主义”的意识，在像申维这样的60年代出生的青年作家中已并不鲜见，但是，他们对“英雄主义”和“英雄主义时代”进行反思与批判的文本操作方式，却是千差万别、姿态各异的。我以为，在申维的这部《我们的那个时代》中，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作品在这种反思与批判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独特的机智，一种叙事的机智，是种幽默与反讽的机智。

从小说的内容上看，申维在这里所选择的是一个早已不再新鲜的题材：“文革”时期，一群孩子的生活与成长的轨迹。我们知道，这一题材在近20多年的时间里，经过几代作家的反复讲述，如今已很难再引起人们的阅读兴趣，并且描写这一题材的经典作品，如刘心武的《班主任》等小说，也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得到了历史性的确认。因此，今天的作家再来重写这一题材，则无异于是一种冒险。但冒险是有意义的，冒险意味着开拓和超越，一切进步、一切创新都是对于陈规的冒险。我们对历史的反思与重新解释，对于历史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冒险，



而历史正是在这样的冒险中才得以进步的，历史的意义正体现在人们对历史的反思之中，以至于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么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反思“文革”的那段历史，则同样是一种超越，我们今天如何来理解那段历史，也许比那段历史本身更为重要，重要的并不是理解什么，而是怎么理解。这个观点体现在西方结构主义的小说理论中，就是“重要的并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青年作家申维对“文革”时期的那群孩子的生活与成长轨迹的描写，正是在“怎么理解”和“怎么写”这一点上获得了超越。

我曾经在一篇题为《从物本主义、神本主义到人本主义》的文章中，把中国从“五四”到20世纪70年代末的这一段历史概括为“英雄主义时代”。我在分析建国后的“英雄主义时代”的特征时还说过：“建国后的英雄主义时代事实上又是一个‘造神’时代”。“文革”时期显然是这个时代里最具代表性的时期。进入8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正逐渐向“平民主义社会”转化。到了90年代，这种转化的痕迹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有了较为鲜明的体现，尤其是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对20多年前的那个“英雄主义时代”与延存至今的“英雄主义思想”的反思与超越，已经成了当代的作家、学者最为迫切的任务，我把这个任务称为在反思中建设和选择当代的“平民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和立场。我们看到，申维的《我们的那个时代》这部小说正是从“平民主义”的立场上来对“文革”进行反思的。今天的这种反思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对“文革”的反思有着本质的差异，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人们对“文革”的反思是在同一种文化价值体系之中所进行的反思，而今天人们对“文革”的反思则更多是站在一个新的文化价值立场上，对另一种文化价值观念所进行的反思，这也正是申维的《我们的那个时代》与刘心武的《班主任》本质不同之所在。但申维的机智之处，却不仅在于他选择了一个新的文化价值立场，而且更在于他叙事的方式，在于他小说整体上的幽默与反讽的效果。

《我们的那个时代》这部小说的叙事方式，从表面上看，如果我们引用利奥塔的概念，似乎全都是由“小叙事”构成，而缺乏整体的“宏大叙事”，构成小说的诸“小叙事”之间似乎缺乏有机的联系，因此从某种角度看，也可以认为它带有一些“后现代”特征；但如果我



们仔细地分析一下这部小说的结构，我们就会发现它并不缺乏“宏大叙事”，只不过构成这种“宏大叙事”的诸“小叙事”之间的线索已不再是我们所习惯的时间线索或故事发展线索，而被转换成了隐于诸“小叙事”背后的形成人物性格和人物命运的逻辑线索。就像戴了上帝面具的撒旦一样，因为面具，所以就把撒旦的本质与上帝的表象联系在了一起。申维小说中的这个逻辑线索体现在：把学雷锋与偷窃、欺骗、失贞、恶作剧联系在了一起，把阶级觉悟与恃强凌弱联系在了一起，把孩童的游戏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了一起，把好学生与自私鬼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个线索所戴的面具，就是“文革”那个特定时代的教育与社会价值观念。学雷锋、学习工农兵、阶级斗争以及上山下乡等等，都是那个时代的“宏大叙事”，同样“宏大”的还有以正义的面目出现的阴暗、卑鄙和邪恶。如果我们不考虑联接小说中诸“小叙事”的这个逻辑线索，我们似乎可以把小说中这些拼盘式的“小叙事”看作是对“宏大叙事”的一种解构；然而，即使我们把这些“小叙事”所凝结的人们对“文革”那段历史的重新理解，看作是对“文革历史”这个“宏大叙事”的解构，它也远没有“文革历史”中的“恶”的“宏大叙事”对“善”的“宏大叙事”本身的解构来得更为彻底。

这就迫使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申维之所以选择这种叙事方式的原意何在？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回到作品中来。我们发现，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如老巴子、严小四子、刘红英、花红蕾，甚至他们的老师马小丽与赵大饼等人，在“东方红小学”所标示的那个年代，都处于利奥塔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与“小叙事”的混合交替之中。如果说当时的集体行为与集体价值是一种“宏大叙事”，那么个人行为与个人价值则是一种“小叙事”。而事实正如这部小说所反映的——在那里，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总是相悖的，而且集体行为当中经常掺杂着反其道而行之的个人行为。当然，集体行为和个人行为都不仅仅是这些，但在“文革”那个时代，个人行为的异化和极端化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集体行为的异化和极端化导致的。在当时的那个极端“英雄主义时代”，社会对集体的价值这个“宏大叙事”的极端肯定，几乎完全否定了个人的价值这个“小叙事”，而这正是我们对“文革”所要进行反思的症结之所在：个人的价值是不应被否定的，如果一个时代要否定个人的价



值，那么它必将付出个人行为与集体行为被双重异化的代价。今天我们的社会正在走向“平民主义时代”，这个时代将以重新肯定个人的价值来作为自己文化价值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因此我们在反思“英雄主义时代”的时候，我们也必将以“小叙事”的方式来完成“平民主义时代”的“宏大叙事”。申维叙事的机智正在这里突现了出来，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之所以采用这种拼盘式的叙事方式，目的就在更方便以今天的视角来反映‘文革’那个时代，从而突出其荒谬性来”。

申维小说中的叙事的机智还表现在语言上，主要体现为幽默与反讽。《我们的那个时代》这部小说的语言很有王小波的遗风，整体上有穿透力，细节上耐人寻味。申维语言的幽默不同于鲁迅式的幽默，也不同于钱钟书式的幽默。鲁迅式的幽默是让人感到笑不出来的悲哀，钱钟书式的幽默却是让人一笑了之。而申维的幽默则先是让人捧腹大笑，笑过之后却又不得不因为悲哀而陷入沉思。在这部小说中，最让我捧腹的是这样的一段：“在这之前，小四子从没想过马小丽会有屁股。他光想着那一张洁白的生动的脸。在小四子眼里，马小丽是神圣的。他没料到如此神圣的马小丽竟然有着磨盘大小的屁股……这件事对小四子的打击重大，象征着一个英雄神话时代的结束。”这样的幽默不仅仅让人发笑，而且极具反讽意味。笑过之后，我感到悲哀的是，就像严小四子从没想过他神圣的老师马小丽也有屁股一样，在那样的一个时代，人们同样从来都没有想过神圣的“文化大革命”竟然会是一个错误，那时绝大部分人的思想意识竟然还不如一个小学劣等生严小四子。这样的情况在今天是否还会再次出现呢？也许很难保证。类似这样的幽默在这部小说中俯拾皆是，它会让人在阅读中不时地笑出眼泪。

就小说的结构来看，虽然它是众多“小叙事”的拼盘组合，但在整体上它仍是浑然天成的。从出了毛病的记忆引出对童年记忆的修复，并展现了一个荒谬时代里一群孩子的荒谬生活，再到让这些童年记忆在时间中流逝，体现了小说结构的完整性。他们的童年记忆虽然“早已经沉入似水的流年之中”，但他们的生活仍在时间中继续。这随着时间而不断改变的生活，不仅仅是“东方红小学”的名称改成了“求是小学”、“实验小学”或“培智贵族学校”，也不仅仅在于县委大院门口的广场名称从“红场”改成“红旗广场”或“曼哈顿广场”，它的意义更



在于，“英雄主义时代”和人们对它的感受已在似水流年中流逝，而人们的生活将在一个新的“平民主义时代”里获得新的意义。《我们的那个时代》中的叙事是机智的，诙谐而且幽默，让我们的阅读充满快乐。这里，我想起法国评论家罗兰·巴特。巴特曾经把文学作品分为两类，一类叫“快乐的文本”，另一类叫“极乐的文本”。至于什么样的作品叫“快乐的文本”，什么样的作品叫“极乐的文本”，巴氏语焉不详。但如果要我来模仿巴氏的概念，以来对申维的这部《我们的那个时代》进行归类或命名，那就不妨称之为“机智的文本”吧。



为 一 代 国 人 立 传 (序三)

孙德喜

在我的印象中,“传”通常是给那些各种各样的名人、要人立的,但那是在历史散文领域。到了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在小说领域中开创了为连姓名都不很清楚的非常渺小的阿Q立传的先河。显然,鲁迅为阿Q立传,并不是要写出阿Q的传奇,而是以阿Q来概括上个世纪之初国人的命运和精神状况。后来,胡适和废名分别创作了《差不多先生传》和《莫须有先生传》,对国人的某些精神特性作出了精辟的概括。新近,青年作家申维创作的小说《我们的那个时代》同样是为国人立传,他是在为我们这一代国人立传。

面对着申维笔下的老巴子,我越看越觉得他的人生与我们这一代人何其相似!老巴子与我们这一代人一样,出生于1960年代前期,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论理来说,该是幸福的一代。然而,我们这一代人就在刚刚记事之时,却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文化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的作用下,在大动乱的社会环境中,我们这一代成为严重缺奶的一代。

从老巴子情况看,他出生于1964年,当时正是“文革”的前奏——“四清”运动轰轰烈烈开展之际。当他三四岁开始记事的时候,“文革”爆发了,他虽然是盐商的后代,生活在唐城中,他所生活的“迷园”本来是很有文化氛围和文化积淀的地方,本来可以为小老巴子提供良好的教育。但是,老巴子却连托儿所和幼儿园都没有进,而是成



天与那些身心不健全的人生活在一起。比如，被关闭在书房里的大舅王先进是个精神病患者，一直将自己想象成身陷囹圄的革命者；小姨妈王美丽（瘫巴子）虽然拥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但是其精神发生了严重的畸变，成天沉湎于与工会老何那种虚幻而畸形的恋爱中；父亲红旗平时不在家，回来时就忙着供奉红宝书；小舅王胜利忙着造反，在唐城城里折腾；大姨妈王任昭是文化局的干部，此时忙着拆毁文物；奶奶王尔姨由供菩萨改供毛主席；母亲王慧莲是在尼姑庵里长大的……总之，到了“文革”这个横扫一切异类文化的时代，这些人均已经迷失了方向，自然不能给老巴子提供精神上的启蒙。老巴子所生活的“迷园”，或许正如其名所示，乃精神“迷失”之园，这里是一个比较封闭的场所，但是“文革”的风暴还是波及到这里，它给老巴子提供的是一个封闭却又荒唐的小圈子。后来，老巴子随父母搬到了联合的机关大院，这里的环境与迷园相比虽有一定的变化，但是仍然保持着半封闭状态；老巴子周围的人虽然也有变换，但是给老巴子的影响不是荒唐就是粗俗，造成了他的顽劣品性。随后，老巴子随父母下放到偏僻落后而又贫困的农村，使老巴子流落在精神与物质双重贫困的荒原上。后来，老巴子进入东方红小学上学。在这所城里学校中，老巴子他们一会儿学农，一会儿学军，一会儿学工，一会儿学雷锋，就是没有好好地学科学文化知识，而且在学农、学军、学工、学雷锋的过程中，老巴子这帮人不仅没有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反而在荒唐的社会环境中受到江湖文化和地痞习气的耳濡目染，变成了与刘心武《班主任》中宋宝琦相似的街头小混混。“文革”结束以后，老巴子由于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的双重低下，又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和人际关系，老巴子虽然可以挣点工资，比一般农民活得神气，其实他非常可怜，只能处于听人使唤的地位，充当别人的工具，就连到老板的办公室受罚的资格都没有。到了新世纪，老巴子终于被挤出了社会舞台，他和老婆花红蕾先后下岗，失去了工作，只好去搞被新世纪里的新新人类所视为最无用、最弱智的历史研究。老巴子的人生让我们想到了沈小梅子的妈妈在他发晕时所作的判断，老巴子“断奶早了，精血亏”。其实，老巴子岂止是“断奶早了，精血亏”的问题，而是严重的文化营养不足和精神中毒。老巴子这几十年的人生道路，确实就是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的真实写照。我们这代人虽然并不



都像老巴子那样出身于盐商富甲家庭，并不都出生于唐城这样的大中城市，并不都有下放的经历，但是我们都是在开始记事时遇到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民族大灾难，有些人像老巴子一样随父母下放农村，更多的则是像沈小梅子、小佬亨、猫狗子这些农村娃一样是在泥土和草丛中摔滚长大的，在贫困和饥饿中挣扎长大的。其中有些人可以像老巴子一样进了学校，但是学校常常停下课来要学生走出学校去学农、学军、学工、学雷锋。等到“文革”结束，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已经中学毕业，除了少数考取大学之外，绝大多数回乡务农，有些进城打工，还有许多人像严小四子那样自谋职业，艰难谋生，还有不少人像老巴子和花红蕾一样下岗待业，过着庸常的生活。

二

如果要对我们这一代国人的的人生作出最简练的概括，我以为最恰当的词语就是：“英雄”与平庸。具体地说，就是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是在神话般的“英雄”幻象中度过的，这也决定着我們到了中年时人生的平庸。

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就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于这个时期的叙事，30余年来的文学一直持续不断。如果说“伤痕文学”偏重于对于那个惨痛的灾难岁月的记述，“反思文学”侧重于对于那个悲剧时代的反省，王朔善于对于那个狂热十年的调侃和揶揄，王小波习惯于对于那个怪诞年头的嘲谑和讽喻，那么申维的“文革”叙事则让我们看到了“文革”的另一个侧面：狂欢的“文革”。以老巴子当时的年龄和经历来看，“文革”中的血腥和恐怖早已给浓厚的英雄情结激起的精神亢奋所遮蔽，留在记忆中的只有因无知而感到的兴奋、娱乐和快感。

“文革”是一个制造神话的年代。如果说人类在其童年时期出于对大自然和鬼神的敬畏，在原始思维的作用，想象出一个个神话，那么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们出于领袖崇拜和英雄情结，则不断地制造出一个又一个神话。这些神话既有对领袖的崇拜，又有对英雄的敬仰，既有盲目的时代歌颂，又有自恋自大的自我夸张。当时的人们之所以如此热心制造神话，既是为了向领袖表忠心，又是为了拉大旗作虎



皮蒙混人，既是为了自我陶醉，又是为了满足虚荣心。因而，不仅官方在不断地制造神话，就是普通百姓，甚至少年儿童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制造神话，而且大家都沉湎于神话之中。为了制造神话，人们纷纷篡改历史，美化自己。老巴子的奶奶掩盖了老巴子爷爷与黑寡妇、地主婆子之间的情仇恩怨史，将他们的家族历史美化为革命史。在历史被篡改之后，老巴子奶奶的家庭成分便被神化了，于是老太太产生了强烈的优越感，在老巴子妈妈王慧莲面前趾高气扬。东方红小学的工宣队队长赵卫东（赵大饼）也是以篡改了自己的历史来蒙人，从而爬上工宣队队长位置。既然历史可以被篡改，那么虚假必然横行，而当虚假弥漫整个世界时，真相不仅被掩盖，而且也没有人去关注，历史也就化为虚无缥缈的东西。于是，我们民族便患上了非常严重的集体遗忘症，国人也就变得麻木和冷漠，对于任何灾难和血腥都失去了感觉。所以，到了这个时候，王先进患了精神病，没有人表示同情和怜悯，就连母亲王尔姨都无所谓；吴金贵自杀身亡，没有人过问；江浦的五七干校里，山上的大石头砸死人，省城干部受不了磨难而自尽等等，都不过是王慧莲饭后的谈资；红旗大队的老瞎子投河死了，在民兵排长赵卫东看来是“自绝于人民”；东方红小学里，刘红英生病了还被鼓动去参加运动会比赛，结果送了性命，虽然后来学校为她举行了追悼会，但是那也不是出于对生命的珍爱和敬重，而是仅仅为了宣传，而且追悼会上并没有应有的悲愤气氛；储豆豆被课堂纪律逼疯了之后，同样没有人表示同情和关注。就在人们对一切人间的灾难和死亡无动于衷之时，一个狂欢时代到来了，所有的人尽可以踏着别人的血迹、痛苦与尸体寻欢作乐，而且没有人追究责任。那些受到伤害和侮辱的人尽管少不了一时的痛苦，然而由于很快地遗忘，并且可以在他人的身上发泄和施虐，同样也能获得快乐。这是怎样的狂欢？！

这样一个狂欢的时代，让人生活在虚幻的英雄“幻像”之中。渐渐地，人们超脱了现实的苦难和卑微，将自己幻化为盖世英雄，头脑中自己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即使在受辱之际，内心依然充满着英雄的豪迈之气。且不说病态中的王先进一直将自己想象成江姐这样的牢狱中的对敌斗争英雄，就是红旗给儿子起“老巴子”的名字时，也是将儿子想象成解放全世界、拯救全人类的英雄（老巴子父亲的这个美好愿望，



实际上非常明显地陷入了悖论：一个人如果连自己都还没有解放，处于非常可怜、非常卑微、非常低下的地位，他又如何去解放别人？他又凭什么去拯救别人？）就连那个刚一见面就被老巴子当作叫花子的赵卫东都将自己打扮成“刚从雪山草地走过来的红军战士”。至于那些参加武斗的人也都以自己是了不起的英雄，为了所谓的理想而冲锋陷阵。一个人如果将自己想象成英雄，他就会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强大，自以为是，要求别人归顺自己，对别人颐指气使。如果别人没有臣服，那就要通过武力来征服。唐城与联合的好派与屁派之间的武斗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的思想信念，有的只是你征服我、我征服你的强烈欲望。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逞英雄，实现英雄之梦的。当自己不仅不能征服别人，反而被别人征服之时，那就只好像阿Q那样缅怀从前的英雄“壮举”，以精神胜利法作自我安慰，或者像吴老头（吴金贵）那样自杀。然而，此时的“英雄”并非真正的英雄，更多的则是堂·吉珂德攻打风车的闹剧，或者说，不过是阿Q闹革命式的“英雄”。

成人世界如此，老巴子他们这些儿童当然深受影响。在这样一个制造神话的时代，老巴子自然会染上中国时代的病症。当年，老巴子母亲王慧莲就为老巴子的出生编造了一个群鸟盘旋于产房上空的神话，然而老巴子的人生并没有像神话那样显现出辉煌。“老巴子从小就有英雄情结，他总以为自己是个大人物，将来要名垂青史。”老巴子自记事起，一方面崇拜领袖、崇拜英雄，一方面将自己想象成领袖和英雄，乃至在生活中充当英雄。还在四五岁的时候，老巴子就做起了英雄之梦，为了圆这个梦，他轻信郭英雄的话喝了一茶缸的尿。虽然老巴子不懂得什么是英雄什么是领袖，但是他已经跟在成人后面学，模仿成人的行为。成人的荒唐行为深刻地影响着他，成人搞批斗，他会参加；成人上街游行，他也组织一些小朋友喊口号，搞游行。在红旗大队，他把自己装扮成解放军的模样，与沈小梅子、小佬亨、猫狗子以及沈小梅子家的小草狗二黄组成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他走在最前面，“手里拿一根棍子，当指挥刀”，俨然一支部队的指挥官。后来，他成为东方红小学学生时，又与严小四子、刘红英拜把子，他虽然年龄最小，而且在爬树比赛中没有比过严小四子和刘红英，却靠耍起小聪明，做起了大哥，充当领袖。然而，儿童毕竟是儿童，在对成人行为的模仿中，由于心智不够



发达，再加上缺少应有的启蒙和教育，老巴子的这种模仿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于是出现了老巴子得意洋洋骑“忠”字猪的情景，这就使他的模仿显得十分荒唐滑稽，具有强烈的喜剧色彩和悲哀的意味。

“文革”结束以后，老巴子已经步入成年人的行列，当年的英雄幻象破灭之后，老巴子仿佛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的可怜和渺小。他当了教师却由于社会地位低下，连个对象都难找到。为了改变社会地位以便找对象，他通过走后门调进了市府机关所属的压力容器检测所工作。到了这里，他处于机关的最底层，就连那个在首都机场尿了裤子的卫红他都得伺候。在压力容器检测所工作，老巴子不仅得干最苦最累的活，而且常常处于尴尬的境地，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他在一所中技学校任教时，评职称、分房子、加工资、评先进，他都没有份，渐渐地沦为社会边缘人。到了新世纪，他已彻底边缘化了，只好到敬老院里去研究为新新人类所不屑的历史，成为一个庸常而可怜的人。

三

老巴子这一代人之所以成为严重缺奶的一代或者说平庸的一代，是与当时的文化教育和社会影响分不开的。老巴子在学校学习的这些年，作为人类文明的思想文化，他没有学到什么，倒是红色的造反文化、革命的狂欢场景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江湖文化对他影响深刻，造就了他畸形的人格形态和心理特征。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最重要的文化就是红色的造反文化。所谓造反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暴力文化，就是打着革命的旗号，破坏社会秩序，摧毁人的理性，以武力的方式争夺权力的文化。还是儿童的老巴子长期生活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自然要染上这个时代的文化病症。他经常目睹到社会上的武斗和批斗的场面，而且还时时模仿。这使他后来与严小四子等人混在一起，打架、偷盗、耍流氓，制造了不少恶作剧，成为街头的小混混。1983年，小四子在严打中被捕并被判重刑。老巴子在走上社会以后，虽然没有成为流氓犯罪分子，但是当年造反文化所形成的流氓意识仍然不时在他的头脑中沉渣泛起，比如在压力容器检测所，老巴子即以写人民来信成为一个“一流的掘坟客”。

老巴子成长的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为了树立毛泽东思想的权